

人民日报昨日刊文发问:

中国经济领跑全球 股市为何疲软不堪

作为世界经济增长重要领跑者之一的中国,其A股市场今年上半年与未能走出经济疲软的欧美主要国家资本市场相比,反而显得对预期的信心不足。虽然沪深主板指数半年累计跌幅均不到3%,但股民投资赚钱之难、市场遭遇“做空”压力之大,与不少资金需求者轻而易举地从股市变相“抽水”,形成鲜明对比。

股市的结构性风险突出

4月6日,上证综指时隔4个月后再冲上3000点大关,但在8个交易日后,沪指便开始从年内3067点的高位一路下挫,直至6月20日跌至2610点的今年以来最低点。

这样的“过山车行情”让投资者吃尽苦头。虽然上证综指与深证成指两大股指上半年的跌幅分别仅有1.64%和2.79%,但国内一家大型网站进行的“上半年股民生存状况调查”显示,在参加投票的逾24000人中,有83.5%的股民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亏损,而盈利在10%以上的股民仅占参与调查人数的10%。为何投资者损失惨重?

“上半年股市的结构性风险比较突出,中小板和创业板的部分公司股价跌幅很大。”平安证券研究所首席策略分析师王韧说。与两市主板市场下跌不到3%的“错觉”相比,深证中小板指数上半年下跌14.83%,深证创业板指数更是暴跌了25.64%,很多曾希望“押宝”小盘股的股民被深深套牢。

不少细心的投资者还发现,就在欧洲忙于处理蔓延的欧债危机,美国逐渐陷入定量宽松政策

负面效应的同时,GDP增速远超欧美的中国,其A股涨幅却逊于欧美股市。记者统计发现,上半年美国道一琼斯指数累计上涨7.21%,德国DAX指数上涨6.68%,法国CAC指数上涨4.66%,就连经济疲软的英国,其股市的主要股指也略微上涨了0.78%。

三重因素叠加几乎压垮市场

从去年11月2日沪深股市5443亿元的“井喷式”单日成交额,急剧下降到今年6月20日两市总成交额仅有1100亿元,依靠入场资金推动的中国股市为何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活跃度剧减?记者对上海、深圳多位经济学家和市场人士进行采访后发现,中国股市遭遇“做空”原因众多,其中有“三座大山”几乎压垮市场。

其一是市场对通胀和紧缩政策的担忧。7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6月份CPI同比增幅达到6.4%并创下3年来的新高。对此,浙商证券总裁助理、研究所所长邓宏光坦言,通胀“不战而退”难度不小,这势必对市场存在潜在的压力。

而在7月7日央行再次加息后,市场不仅仍对回收流动性的力度心存芥蒂,同时在203家创

业板上市公司中有45家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下滑的情况下,加息对企业经营成本的提升也导致了估值的进一步调整。

其二是国际板给市场带来的心理压力。5月下旬,国际板“越来越远”的信息让A股市场再下一个台阶。“虽然国际板对市场的冲击或将有限,但‘从错理论’有可能让投资者过分关注其中的负面因素。”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微博)说。

其三是国际市场中一股做空中国股票的暗流涌动。进入6月份以来,在美国爆发的“做空中国概念股”浪潮逐渐蔓延至香港市场。其中,雨润食品因做空基金发布的所谓负面调查,6月以来在香港市场股价连续暴跌,已经对国内相关板块上市公司股价造成了联动影响。

股市资源配置功能依然较弱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袁绪亚认为,我国股市募资虽多,但其资源配置功能依然较弱。这直接体现为,国家战略导向的行业在股市上的融资情况并不乐观,反而很多成长性不强的传统企业频频成功上市,并获得了高价发行。

据人民日报

对话

结构性风险只是外部因素



刘青
江苏省党校
教授、证券
分析师

现代快报: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触动?

刘青:我想说的是,要让优质企业无障碍地尽快通过审核,让市场壮大起来,让造假者自动地“死掉”。现在的审核制度其实仍然是许可制度,容易存在寻租空间,造成股票价格的扭曲。对市场信息的管理要加强,该保密的时候要保密,该公开的时候要及时向投资者公开。

现代快报:在你看来,中国股市为什么没有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

刘青:中国经济一直向好,但是中国股市却不能让股民赚钱,价值投资不能得到很好的回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结构性风险突出”,说明了在制度设置上存在问题。股市设置的目的是让企业直接从市场上融资,融资后就会有红利,然后它可以分红,也可以不分红,我们能看到中国股市中“铁公鸡”上市公司的存在,多少年来从来不分红。然而股民强调的是,还不是分红吗?但我们现在片面地强

调股市的高成长性,让它拆细再拆细,通过散布种种消息,让股价在市场上翻腾。这对谁有利?股民肯定没利,因为他们没有大的资金,即使有大的资金,也没有一个好的消息来源。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的上市公司只能上市,不能退市。

现代快报:问题是中国股市有退市制度吗?

刘青:是有,但是没办法执行,因为已经上市的公司被称为壳资源,是很值钱的,并且要通过证监会的审核是非常困难的,而借壳上市却容易办到。今日的门槛高,退出又“难”,所以就令壳资源非常紧俏。这样一来,优胜劣汰的基本机能就丧失了。结构性风险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仅仅是外部性因素,最为根本的原因是:上市公司的审核制存在缺陷;大股东侵蚀小股东利益的救济途径缺少;内幕交易猖獗而不能有效遏制。资本市场监管制度本身出了问题,这是根本原因。

现代快报:这些问题对普通股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

刘青:的确,这些问题传导给股民的信息就是:我长期的投资是不值钱的,我长期持有股票是不值钱的。这就等于“鼓动”了人们投机。所以我国股票的换手率很高,但赚钱的很少。换手率高,就意味着有中介公司从中做手脚。有不少综合类的证券公司,既可以自营,又可以做代理,而这一过程中,有可能产生误导。

快报记者 刘方志

热点纵论

“官员抑郁死”正制造新的释疑疲劳

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被发现于其办公室内颈部割裂死亡,此前曾有传言称,张海忠之死与其生前主抓的拆迁工作有关。邯郸市警方通报称,张海忠系重度精神疾患自杀死亡,也即通常所称的“抑郁死”。

(7月13日《新京报》)我抑郁,我自杀。这些年来,官员自杀事件频发,紧随其后的则多是整齐划一的“抑郁死”解释。从病理上来说,抑郁症的确不是什么稀罕的精神疾病,可我们看到了一个情景是:官员“忧郁死”的官方解释,总是激起非议一片。你只要点开张海忠自杀相关新闻的微博评论,就不难窥

见类似的情绪。

不能用“选择性失聪”肤浅地解释公众的不相信,因为与此相对应的一个事实是,这些非议多发生在本身就疑窦重重的事件中。张海忠被怀疑因拆迁而死,如果没有详细的调查和释疑,一句轻飘飘的“抑郁死”又怎能抹去围观者心头的疑云?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去年6月,民航中南局局长刘亚军卧轨自杀,民航总局随后在其官网上宣布刘自杀系精神抑郁所致。但公众发现,就在刘亚军自杀前,他辖区内的7名中高层管理人员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其与刘亚军之死的关联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可

民航总局的说明对此未着一字。

人们之所以把怀疑的目光投向“抑郁死”,是因为太多的死因调查绕过了公共利益。常识与经验告诉我们,这样匆忙的盖棺论定,既是对死者的不尊重,也可能从此就关上了黑幕的大门。试想一下,既然以“抑郁死”为张海忠死亡画上了句号,那么其背后的拆迁猜疑调查,自然永远不会再被提及。而这恰恰是张海忠之死的最大疑点。

“抑郁死”了,当事官员即便有丑闻,也不会被揭露,牵涉其间其他官员也终于不再“抑郁”——利益如此盘根错节之下,“抑郁死”无疑成了最优化

的选择。这样的结论也许不适用于张海忠之死,但毫无疑问,它有着成为现实的土壤。

在这个时代里,我们目睹过太多词语的沦陷与被扭曲:躲猫猫、70码、我爸是李刚……“抑郁死”不过是又一个佐证。越来越多的事例在表明,“抑郁死”正在成为一个令人疲乏与难以置信的释疑词汇,这事实上已是一种警醒,那些对官员之死的完全不真相呈现,看似正义凛然,终究难掩悠悠众口。我们需要彻底、不回避真相的官员死因调查。否则,一个官员在“抑郁”中死去,更多不明真相的眼睛也无法释然,众口依旧汹汹。(王聘)

新华时评

发展的要害绝不是“速度”

13日出炉的中国经济半年报中,连续两个季度经济增速的回落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甚至不乏“硬着陆”的担忧。然而,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而言,速度的快慢绝非要害。

中国经济增速正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一揽子刺激计划带来的恢复性非常态增长,转向自主稳定增长的正常增长区间。在这一重要背景下,速度的适度回落,符合宏观调控走向。

和经济增速的数字相比,真正重要的是,整个“十二五”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发展方式的转变才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要点。想有所得,必有所失。对房地产市场进行调控,对高耗能产业进行控制,对内外需关系进行重新调整和平衡……这些事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性调整,都会以损失当前的一定速度

为代价。对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进行深度调整,对居民消费进行提振,对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完善……这些措施短期内难以为经济增速增光添彩,却可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从“九五”计划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算起,关于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正在经历第四个五年规划。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一再提醒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下定决心毫不动摇地推下去。否则若是一看到经济增速出现回调就动摇了决心,再回头走靠摊摊子上项目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老路,不但功劳一篑,而且会错失历史良机。

未来能否再上台阶,关键看转变发展方式这一关能否真正迈过,而不是短期内经济能否保持高速增长。

新华社记者 刘铮 王希

公民发言

“大干快上”不仅要取消口号

河北省委书记张云川批评了少数部门在工程建设上的浮躁作风,他表示将坚决取消“决战90天”“大干快上”等冒进标语口号,工程建设必须尊重科学规律。(7月13日新华网)

随便在网上搜,就能搜出一大堆与“大干快上”有关的坏消息:由于“大干快上”,青海最大拆迁移民安置工程出现了21栋“楼脆脆”;最近,云南的“短命公路”据说也与“大干快上”有关。可以说,在很多领域,都存在违背科学规律只为政绩服务的“大干快上”现象。

“大干快上”的后果往往会很严重。比如,河北保障房建设由于“大干快上”,11个项目存在质量隐患被河北省住建厅曝光。至于一些发生过重大事故的“要命工程”,往往也有“大干快上”的因素在里面。

“大干快上”流露出的激情似乎多于理性。一些献礼工程为了“大干快上”,还特别成立突击队,似乎只要“大干快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规律都能被打破。

张云川表示将坚决取消冒进标语口号的做法值得肯定,但仅仅是取消冒进标语口号还不够,必须从根本上纠正“大干快上”。其一,所有工程项目都要根据科学规律安排工期。其二,坚决杜绝公权力插手项目施工,迫使施工企业赶工期。很多重大工程赶进度多是因为地方政府为了“献礼”,为了政绩,完全忽略了科学规律。其三,我们普遍热衷于刷新纪录、争创奇迹的习惯和风气该改一改了。毕竟,很多事物发展都有科学的周期,不能为了争创奇迹而置安全隐患于不顾。(张海英)

公民发言

杭州版“许霆案”纠结在情理之间

在杭州打工的张青到银行给家里汇款时,发现还没插卡,按键时ATM机就自动吐钱,他取出了10500元。2小时后,他向警方自首,并愿赔偿失主损失,但仍被检方以涉嫌信用卡诈骗罪提起公诉。

(7月13日《今日早报》)

此事难定性。若依照“亡羊补牢,犹未晚矣”的训条,张青虽“动了他人的奶酪”,才可过2小时就悔悟,大可宽恕。更何况,就像许霆案中的“特殊因素”——ATM故障一样,张青事件的“他人忘了取卡”,也是让张青临时入歧途的诱因。用刑事诉讼中的“警察圈套”理论分析:若张青是蓄谋已久,从他人手中诈骗信用卡,无疑属于犯罪;可他是在ATM自动吐钱的诱使下才跌入迷途。追究刑责,似乎太过残酷。但法律未必能读懂人情的眼泪。依检方说法,张青已触犯刑法第196条中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罪名,是犯罪已遂,就算“弃恶从善”,也只能量刑从轻。这番解释,不乏道理,但显然忽略了关于“警察圈套”的考虑。公众为张青鸣不平,正在于“他是无意得卡,而非主动诱骗”,若法律不虑及人性的局限,未免不通人情。

情归情,法归法,但前提是法理能体现公平、正义等精神,经得起辩疑。张青若被追究刑责,至少有几个疑点待解——其一,当ATM机出错或别人忘了拔卡,责任何以划定?能否武断地将“盗窃罪”“诈骗罪”的帽子,给过失者扣上?其二,法律惩处时,力度得宜吗?

见财起意,过失难辞;但何以“罪刑相适应”,公正地权衡责任,是杭州版“许霆案”中的情理纠结。可以肯定的是,如果“ATM机上的脑筋急转弯”仍愚而未决,法律仍留下盲区,那谁也没法肯定,“你错或没错,法就在那里,不偏不倚”。(余宗明)